

禁區一:過分滿足造成寶實語言滯後

父母類型:「熱心幫忙」型
犯禁表現:「寶實,是要喝水嗎?媽媽給你拿。」不少父母過分滿足寶實的要求,若寶實指著水瓶,家人立馬「領會」寶實這只是想喝水了,於是把水瓶遞給他。

犯禁的害處:爸爸媽媽過度滿足寶實要求的方法使寶實的語言發展緩慢,因為他不用說話,家人就能迅速明白他的意圖,並達到他的要求了,因此寶實失去了說話的機會。

破禁辦法:當爸爸媽媽從寶實的行為舉止中發覺寶實想喝水時,你可以給他一個空水杯,他拿著空水杯,想要得到水時,會非常努力去說「水」。你可以做此嘗試,當寶實把自己喝水的想法落實到語言上,變成「水」字時,僅僅這一個字,就會讓他歡欣鼓舞。

禁區二:過多使用疊詞

父母類型:過分遷就型
犯禁表現:「寶實,飯飯了!」「寶實看,那是狗狗,那是花花……」用疊詞和兒話說話是寶實語言特定階段的表現,一些爸爸媽媽卻隨著寶實一起說起了兒話。

犯禁害處:寶實用兒語是因為其語言發展限制了他準確表達自己的意思,有些家長卻以為寶實只能聽懂這些兒語或覺得有趣,也用同樣的語言與寶實講話,這樣做就很可能拖延了孩子過渡到說完整話的階段。

破禁辦法:寶實語言發展一般都是經歷單詞句(用一個詞表達多種意思)、多詞句(兩個以上詞表達意思)、說出完整句子這幾個階段,爸爸媽媽應通過正確的教育引導孩子的語言向更高階段發展。當寶實伸出雙手說,「媽媽抱抱。」媽媽就應該給寶實一個熱情的擁抱,並說,「媽媽來抱寶實了。」用正常的交流方式,儘量縮短寶實疊詞或者兒話使用的時間。

禁區三:模仿寶實的可笑發音造成錯誤暗示

孩子學說話父母要注意的三大禁忌!

父母類型:將錯就錯型

犯禁表現:寶實在剛學說話的階段,常常會有一些可笑的不準確的發音,如把「吃」說成「七」,把「獅子」說成「希幾」,「蘋果」說成「蘋朶」等等。有些爸爸媽媽覺得好玩,於是重複寶實的錯誤發音,以博一笑。

犯禁害處:寶實存在着發音不準的現象,是因為寶實的發音器官發育不夠完善,聽覺的分辨能力和發音器官的調節能力都較弱,還不能完全正確掌握某些音的發音方法。如果父母將錯就錯學習寶實的可笑發音,那麼寶實就會得到錯誤暗示,認為自己的發音是對的,這種錯誤的發音可能會因此很長時間難以改變。

破禁辦法:爸爸媽媽不要學寶實的發音,而應當用正確的語言來與寶實說話,時間一長,在正確語音的指導下,寶實的發音自然會逐漸正確。



家庭解體,美國衰落是必然 回歸傳統婚姻家庭觀才能救美國

中國人常說,「家和萬事興」。這句話的內涵不僅僅在於勸諭人們維持家庭和睦,它在經濟學上也同樣是一句至理名言,捍衛傳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對於社會經濟和國家繁榮至關重要。這樣闡發聽起來似乎「陳義過高」,但美國學者米奇·佩爾斯坦(Mitch Pearlstein)居然為此寫了一本書《家庭解體,美國衰落》(From Family Collapse to America's Decline)!



據此,佩爾斯坦認為,除非我們找到一個方法來阻止未婚生育和振興傳統的婚姻,美國的貧富差距將繼續擴大。

除了婚姻,回歸傳統的性觀念同樣有利於經濟。這一點中國的老祖宗早有深刻體悟。他們認為,穩定的婚姻和性關係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私有產權,這樣才能給人以穩定的預期,激勵人勞動和奮鬥。「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

佩爾斯坦在書中論證了傳統婚姻和家庭觀念的衰退與美國經濟衰退之間有「正相關」,並得出結論:美國的經濟復興有賴於向傳統家庭觀的回歸。

家庭的解體對美國經濟有怎樣的傷害?根據經濟學家本杰明·斯卡費迪的研究,僅僅考慮食品券、臨時援助、醫療救助和司法援助等等因家庭破裂而直接增加的政府支出,每年美國的納稅人要付出1120億美元的代價!

另外,如果離婚率高企,意味著更多的美國人在中老年時期,一旦遇到健康問題,身邊缺乏配偶的照顧。從經濟學上講,婚姻健全的家庭在互相扶助方面遠優於其他社會手段,保姆和護士的照顧,在愛心、周到、盡職和信任度等方面顯然不能和長期相濡以沫的配偶相比,需要額外的質量鑒定成本和監督成本,這意味著更高的交易成本。

不得不提的是,婚姻的解體加劇了美國的貧富分化,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結婚率越是保持穩定,而這樣穩定的家庭,給孩子提供了更有利的成長環境,他們在未來的收入和婚姻方面又再次佔據優勢,這是一個良性循環。而相反的情況是,54%的高中輟學的學生,父母沒有合法的婚姻。

一般人顯然更願意為自己的孩子和穩定的家庭奮鬥,如果孩子不是自己的,家庭都處於不穩定的流動狀態,很多人會喪失好好工作的動力。

在美國,1960年代的性解放風潮帶來了這樣的結果:1962年離婚家庭約41萬,1970年升到70.8萬,1978年達113萬。性解放傷害的不僅僅是美國社會,還有美國經濟。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人痛定思痛,保守和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開始強勢回歸。

1976年,連民主黨人卡特都在競選中反復承諾,他的政府一定要把重建家庭問題置于最優先地位。「美國家庭出了毛病」——這是卡特對性解放導致家庭危機的概括。入主白宮後,卡特曾五次召開專門會議,商討制定新的家庭政策。此後,共和黨人里根入主白宮,更是帶來了「保守主義革命」,蓋重視家庭和宗教是共和黨的一貫主張。

自1970年代以來,保守的家庭觀念在美國一路走強。在1970年的時候,有85.2%的18歲以下的未成年入曾生活在單親家庭,到了2005年,這一數據已經降到了68.3%,而且下降還在繼續。這為美國這三十年來的經濟繁榮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你不覺得太對不起中國人嗎?你的中文太差了!」上周在北京坐出租車的時候,司機這樣批評我。其實,這個司機態度很友好,但我還是無語了:我是一個中國人嗎?師傅,難道您認為,凡是長得像中國人都必須會說流利的中文嗎?凡是白人就一定講英文嗎?

作為一個第二代澳大利亞華人,在中國留學的這一年,我不斷跟各種各樣的中國人進行這樣有趣的對話:

「你回國了!很好,你可以看一看祖國發展得怎麼樣!」

我回國了嗎?如果我從沒有來過中國,我可以「回國」嗎?

「澳大利亞人對咱們華人怎麼樣?」

澳大利亞人就不包括華人嗎?如果我在澳大利亞出生、長大,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澳大利亞,難道我還不是澳大利亞人嗎?

身份認同危機

不能只怪中國吧。所謂的身份認同危機很久以前就在我身上出現過。

不久之前,我媽媽讓我想起,小時候我問過她:「媽媽,我為什麼不像我的朋友和同學一樣?為什麼沒有黃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小學六年級時,因為語法考試考得不好,我們的老師竟然當著所有同學的面直接跟我說:「淑琳,因為你來自華人的家,你永遠學不會最標準的英語。」

我還記得自己當時覺得多么不公平:我爺爺三十年代從福建遷到馬來西亞,爸爸媽媽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我爸爸的方言是福州話,媽媽的方言是潮州話,因為難以用方言交流我們在家里都說英語。對我而言,英語就是我的母語。我之所以招致老師的偏見,是因為我有一副亞洲人的面孔——而且,我是這個班里唯一的華裔。

來中國以前,我一直把那些事深藏在心里。但在中國認識來自各國的華裔後,我常有機會與他們聊我們小時候的經歷。有一天,一位阿根廷籍華裔朋友跟我說,她在阿根廷上幼兒園時,老師會把她的玩具偷偷拿給別的小朋友玩。

她的媽媽很無奈,但又不會說西班牙語,只能把他們家開的快餐店里最好吃的盒飯送給那位老師。聽完這個故事後,我控制不住地淚流滿面。沒想到在我瘋狂地學語法的同時,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一個和我一樣的華裔女孩也在承受著相似的痛苦。

中國的崛起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它吸引眾多華裔的原因之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華裔「回」到了中國。但根據我的個人經歷,我身邊絕大部分華裔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尋找答案。對很多華裔而言,他們希望這些由成長,由金黃色頭髮的同學、語法考試、幼兒園老師提出的問題能在這裡得到解答。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太「華」了」

因為有一張華人的面孔,我以為來到中國之後,可以很快解決所謂的身份認同問題。然而,結果恰恰相反。2007年,為了找一份英語老師的工作,我在北京四處奔波。三十幾個面試之後,我放棄了,毫無選擇之下去了湖南農村教書。

現在想來,當時的我剛剛高中畢業,一點經驗也沒有,也難怪沒有人想錄用我。但是,我的很多華裔朋友也經歷過同樣的情況,我們都明白這其中的「規則」:

不管這種對「純正」的外教的期許來源於學生、家長還是學校自身,對很多學校而言,招聘外教時,膚色比教學能力更重要。他們更願意錄用一個母語是英語,但沒有華人面孔的外國人。

在舊金山長大的華裔任麗娜說:「在理論上,如果在中國找實習,會說中文的華裔應該佔優勢。但是我認識幾個華裔朋友,因為他們的面孔,不但沒有這個優勢,反而跟不太會中文的非華裔比處於劣勢。」

她也提到,在中國的外國人雜誌上可以看到專門招聘白人職員的廣告。這樣一來,公司可以讓一張白人的面孔出現在公司網站上、讓這個白人陪他們去開會,顯得公司地位高。我有一位白人朋友從一個中國教育機構辭職,因為被錄用之後,他才發現自己大部分的工作不是管理,而是一個「performing monkey」(被耍的猴子)。

不僅是工作,就連娛樂放鬆時,這張華

至無法接受自己的黃皮膚、黑眼睛,於是她把頭髮染成金黃色、戴藍色的眼鏡。

我以前的中文老師跟我說,她不敢讓華裔學生通過唱典型的中文歌來學習中文,比如《龍的傳人》、《我的中國心》和《我們都是中國人》。因為曾經有學生對此極其抵觸:「我不是中國人!為什麼讓我唱這樣的歌?」

相反,非華裔的學生唱這些歌卻一點問題也沒有。我認為,凡是華裔都多少有一點對身份認同的懷疑,只不過每個人的「度」不一樣,而且每個人會在不同的時期面臨這個問題。

任麗娜說:「我從小就在舊金山跟很多華裔一起長大了,所以我來中國之後才開始考慮身份認同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個現象有意思,到我所謂的祖國才開始感覺到這方面的矛盾。」

到中國以後,我和我的華裔朋友們會半夜三更聚在一個宿舍里,聊各種各樣關於身份認同的話題。一次,不知怎麼聊到了「如果有一

我是一個中國人嗎?

黃淑琳

人的面孔也給我們帶來過不愉快的經歷。一個來自美國華盛頓的華裔何志榮告訴我,某天晚上跟幾個白人朋友到三里屯MIX夜店玩的時候,他成了唯一需要買門票的人。

遭遇過類似情況的不只何志榮一個。今年,澳大利亞籍華裔譚若思去北京一家叫Latte的夜店時,門衛讓五個澳大利亞籍白人直接走進夜店里,卻讓他出示身份證。

「我沒有身份證,我不是中國人。」

門衛一再堅持道:「給我看看你的身份證。」

最後,六個澳大利亞人選擇去了另一個地方。又過了幾個星期,因為北京清理「三非」外國人的一百天行動,警察讓譚若思出示他的護照。這次,他的待遇就和他五個白人朋友一模一樣了。譚若思說:「說白了,作為一個華人,我外國了,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太「華」了。」

一個來自澳大利亞悉尼的華裔陶鈞說,某次他在三里屯打車,可是路邊的司機卻拒絕搭載他。直到他硬是打開車門,與司機攀談之後說明自己是澳大利亞華裔,司機才說:「哦,我以為你是鬼子。我不拉鬼子。」

我是百分之百的澳大利亞人,也是百分之百的華人

願意來中國的華裔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有的華裔朋友曾經跟我說過「打死我也不會去中國」!我的一位澳大利亞華裔阿姨就受不了春節。我認識的一個華裔甚

種把華人變成白人的藥,你會不會吃」。有的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會」,有的人說「絕對不會」,有的人很猶豫地表示「不知道」。看倫敦奧運會時,我們也會討論該給中國隊加油還是給我們國籍所在的國家隊加油,或者如果中國和我們國籍所在的國家對壘怎麼辦。

陶鈞說:「作為一個華裔,你的身份是一把雙刃劍,你需要知道在不同情況下怎麼用它因為每個情況不一樣。有時我會夸張我的「老外口音」,有時別人問我來自哪里,我會回答說「澳洲人,中國心。」

華人是誰?

八月中旬,浙江大學「晨興文化中國」召開了第二屆「文化中國」年度論壇。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和「晨興文化中國」的創立人杜維明老師說:「『文化中國』的目的是給中國人、華人和對文化中國有興趣的外國人一個平台。為「中國人」「華人」「外國人」這三個群體提供豐富的交流契機。」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在外國留學的華裔、來自香港、台灣的華人。我,這個來自澳洲的華裔也在其中。

會議上,兩個香港大學的本科生給大家做了關於香港的愛國教育改革的演講,內容包括香港人為什麼擔心改革,什麼樣的教育可以避免造成洗腦,香港人覺得自己是中國

人、香港人還是華人。

演講結束後,一些大陸學生開始激烈地提問:「既然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為什麼還不接受中國的教育制度?你為什麼覺得中國的教育制度會洗我們的腦?你的意思是我被洗腦了嗎?如果是這樣子,那你也是,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多少被洗腦過!」雖然對部分看法保留意見,但是說實話,我非常享受那樣的討論。我希望來自更多國家的華裔能在將來擁有這樣的平台就這些話題展開討論。這些話題之中,包括對很多華人來說不可避免的問題:對你來說,華人這個身份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意義?

其實,多年以前海外華人的社區中就已經有海外華人組成的協會,而且近年來出現了越來越多專為年輕華人創建的社會團體。舊金山的非政府組織「尋根之旅」(In Search of Roots)每年舉辦一次活動,讓來自舊金山灣地區的十幾個華裔研究他們家族的歷史。上半年參與者在美國採訪、蒐集資料,暑假期間到中國展開尋根之旅,下半年則用於記錄他們尋訪到的家族歷史。

杜老師對我說:「追本溯源往往是一種解放。越多地瞭解你的過去,將越深地惠及你的現在和未來。無回憶則無自由。如果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自由就無從談起。但隨著社會日益走向多元,身份認同的來源不再局限於血統和國家了。」

無論如何,我在中國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人山人海的地鐵上,把MP3聲音調大,讓《我的中國心》的旋律衝擊著我的耳膜。

每當我在中國的白人朋友跟我說:「為什麼在大部分情況下,華人的中國朋友遠遠多於白人的中國朋友?」我心里會想,是因為人天然懷有種族歧視嗎?我覺得人類都想被接受、被認同,卻常常陷入根深蒂固的偏見,走不出這個怪圈。

每當出租車司機聽我解釋完複雜的家庭背景之後,雲里霧里地問:「但是,你還是一個中國人吧?」我會對自己說:算了,別繼續解釋了。

每當我的中國朋友「政治不正確」地跟我說:「如果你是個白人的話,不知道會不會跟你成為那么好的朋友?」我心里的某個角落依然會充滿榮幸。

但是如果這樣想,我會不會變成問題的一部分?

